

于 翀 主编

“青青子衿”传统文化书系

域外传播

黄荣华 李 昕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以前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可能没有怎么关注，一般只是对“四大发明”的传播略知一二。其实，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历史悠久，地域广泛，种类众多。说悠久，是因为中华文化很早就开始了传播之旅，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东传朝鲜，公元前 5 世纪西传古希腊；说广泛，是因为中华文化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说众多，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无数伟大创造，如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皆被传播。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了解不多，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中，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偏向于落后一面。我们的文化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何谓西方中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因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价值、理想追求代表非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扩张，是“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肥沃土壤。西方中心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的观点或立场，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衡量非西方文化价值的方式。中国文化由于在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的比拼中“败下阵来”，很自然就被西方中心主义视为落后文化。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这种“歧视视角”中，我们自己也就逐步接受了这种“被歧视”，以至于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文化。

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3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模糊，只有片段式的想象；13—18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逐步高大起来，至18世纪西方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主义领袖都从中华文化中借力；19世纪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步形成，中华文化落后的部分被放大、定格，以至于中国被西方视为落后的象征，中国人成为西方人嘲笑的对象；20世纪后期至今，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正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我们的文化最受西方歧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也有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以至于终身热爱，如雨果，如托尔斯泰，如黑塞。

本书分为“绪篇”“东方编”“西方编”，以系统介绍中华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绪篇”是从总体上介绍。由于篇幅所限，也由于

我们对中华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认知相比较在西方传播的认知要丰富一些，所以本书侧重介绍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情况；而介绍在东方的传播时则只选取“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其他东方国家则不涉及，这与本书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传播作为介绍的主要内容相关，因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儒家文明，而东方其他国家则不能一概而论。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在逐步显现，在未来一定会有更突出的表现。这里引述托尔斯泰、黑塞和李约瑟的话，以略作参照。

伟大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福音书》，于孔子则无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给好友茨威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我们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如此相反，以至我们应该为地球另一面拥有如此坚定和值得崇敬的一种对极而感到高兴。企望整个世界欧洲化或中国化都是愚蠢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种陌生的精神，否则，人们就什么也学不到，也不能互相接受；我们应该期待远东至少成为我们的老师，就像长期以来我们对西亚所做的一样（只要想想歌德）。”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既要知己之短，也要知己之长，这样才会真正有“可贵”的“聪明”。长期以来，受种种蒙蔽，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似乎只知其短，不晓其长，以至以长为短，这对我们

变成“聪明”人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通过认识别人对我们文化的认知与接受，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使自己真正“聪明”起来。我们期待，这本小书，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点帮助。倘能如此，编写的目的就实现了。



目 录

绪篇 :: 001

 我们这样走向世界 :: 002

东方编 :: 023

 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圈 :: 024

 二 儒学与朝鲜古代的大学 :: 032

 三 汉诗与朝鲜汉文学鼻祖 :: 038

 四 朝鲜的“李太白” :: 042

 五 汉字与日本史书 :: 047

 六 《论语》在日本 :: 053



七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 057

八 儒家思想在越南 :: 066

西方编 :: 071

一 成吉思汗西征与传教士来华 :: 072

二 《马可·波罗游记》与欧洲对中国的向往 :: 079

三 传教士来华与18世纪欧洲“中国热” :: 087

四 儒家思想与西方启蒙运动 :: 104

五 中国文化与歌德 :: 124

六 中国文化与雨果及谢阁兰等 :: 132

七 中国圣贤与托尔斯泰 :: 168

八 中国文化与卡夫卡 :: 183

九 道家与西方思想 :: 200



我们这样走向世界

一、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当今世界主要的文明体，一般认为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在这些文明体中，保持了起源与发展独立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①“所有的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 1500 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 1000 年……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第 70 页。

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间。”^①

在我们一般人的概念中，“中国”与“中华”是混同的。但若从文明意义的表述角度看，显然“中华”所涉更加广泛，因为“中国”具有政治实体意义，而“中华”则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地处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之‘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华’，意谓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教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里发掘的是‘中华’的文化内涵，而并未局限于种族意义。故‘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质人类学概念。”^②

那么，中华文明何以有别于其他文明，能几千年生生不息？文化史研究者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语言文字等方面给予了回答。

中华文化拥有一个更为辽阔的地理发展空间。中华民族栖息的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②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北半球东亚大陆，是一个极其恢宏辽远的地理空间，有 1000 多万平方千米，其中仅黄河流域就有七八十万平方千米。古代所谓的“九州”（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雍州、幽州），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区域，面积在 300 万平方千米左右，可谓天地广大，腹地纵深，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有极开阔的回旋空间，这是其他诸多古文明的发祥地难以比拟的。古埃及文明栖息地尼罗河冲积平原，只有三四万平方千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虽然比古埃及文明依托的尼罗河冲积平原辽阔，但也限制在几万平方千米的格局内；古希腊文明起源的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平原，更是腹地狭窄；印度文明相对来说，它的发源地比较辽阔，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有十几万平方千米，后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但横亘北方的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使得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印度半岛，其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远不及中华文明所处的东亚大陆繁复多样。

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地理发展空间内，中华大地上大致形成了两种经济区——农耕区与游牧区，而以农耕文化为主体文化，古诗《击壤之歌》所描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成了古代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与这种生活方式同时滋长的就是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华社会结构有过发展变化，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家国结构却一直保留完整。严复在《社会通论》译序中说：“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



田，燔诗书，坑儒士……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在这种超稳定的血缘纽带维系下，社会结构也具有了超稳定的特征：

父系单系世系原则不可逾越。在世界各民族中，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初期，都有过父系单系世系时期，但一般此后都有变化。只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因此，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没有女性的地位；在一些专门技术领域，严格遵守“传媳不传女”的家规。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继承关系中，母系成员绝不能染指。因此，除武则天外，中国历史上未有其他女性称帝，而在欧洲、印度，女王、女皇并不鲜见。

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祠堂、家谱、公田，是维系家族的三大力量。《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代全祖望在《桓溪全氏祠堂碑文》中说：“宗祠之礼，则所以维四世之服之穷，五世之姓之杀，六世之属之竭。昭穆虽远，犹不至视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家谱记载全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等。它的作用是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居处迁徙而发生血缘关系的混乱，而导致家族解体；同时也是解决族内纠纷、惩治不肖子孙的依据。公田又分为祭田、义田、学田。祭田收入用于祭祀先祖，义田收入用于救济贫病，学田收入用于族内教育。祠堂、家谱是从精神上维系族众，公田是从物质上达到“收族”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比较中说：“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

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①

家国同构。它是指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的本质就是父亲作为家长，成为家庭的主宰。扩而大之，家族则族长主宰，国家是国君主宰。“家天下”三字是家国同构的最通俗、最简洁的表达。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古印度有种姓制度，在种姓内部，它的意义类似于中国的家族制度，但它严格执行“不同种族不得通婚”的规定，因此它不具有结构全体社会的作用。在古代西方，贵族、平民、奴隶之间界限分明，中世纪僧侣、贵族、平民之间的界限也不能混淆，欧洲社会奉行的是地缘政治、等级政治，而不是血缘政治。

中国古代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除了血缘纽带的维系，还有一种超稳定的维系工具，那就是语言文字。“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有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和物体的汉字组成……这种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文字书写方式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第 70 页。



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①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汉字的创制。

汉字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成熟的汉字——甲骨文产生之前，它经历了漫长的图画文阶段。

图画文是刻画在甲骨上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雏形，或者称作原始文字。从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刻画符号出自贾湖遗址，距今 8000 多年。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舞渡镇贾湖村东侧，1962 年发现。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目前发现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最早的实物资料。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契刻符号的刻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商朝的甲骨文基本一致，因此这些符号应该是 8000 多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

晚贾湖遗址 1000 多年的半坡遗址，是 1953 年考古界的重要发现。半坡遗址位于陕西西安，距今 6000 年以上。考古学家从半坡遗址陶器上发现各种不同的刻画符号 113 个。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些刻画记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晚半坡遗址 1000 多年的陵阳河遗址（位于今山东莒县）、丁公陶遗址（位于今山东邹平）、王城岗遗址（位于今河南登封），也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界的重大发现。这些遗址都出土了契刻符号，考古学家认为它们都具有早期文字的性质。尤其是王城岗遗址的刻符，被认为是有确凿时代的最早的文字。经考定，王城岗遗址属于夏朝初期遗址，距今约 4000 年。其中一个陶器上的一个刻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第 360 页。

符，被认定为“共”（“拱”）字，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汉字。

“图画文”算不算文字？文字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文字学家是肯定的，所以在这些文字学家的眼里，汉字在距今 8000 年前就产生了。但有的文字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成熟的文字不应当用“图画”来表示意义，而应当用超越图画的自成体系的符号来表示意义。

如“人射鹿”这一信息在“图画文”阶段，就是用“人拿弓箭射鹿”这样的图解来传递：



而在成熟的文字产生后，“人射鹿”的意思由“人拿弓箭射鹿”的图解，变成了这样三个字：



尽管这三个字的字形还有很浓的图画意味，但它们已不再是用图画解释意思、传递信息，而是用文字组成句子传递信息。在这些文字学家看来，只有当人们用一个一个文字自由组合成不同的句子来表达意思时，成熟的文字才算真正产生。这样成熟的汉字，到距今 3000 多年的商代产生了，那就是甲骨文。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到商代的甲骨文，走过了约 5000 年的历程。如果再算上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产生之前的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汉字的产生确实走过了漫漫长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图画文的产生，还是汉字的最终产生，都有一个非常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都是集中了无数智者的智慧



才逐渐完成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完全可以把传说中的创字者伏羲、苍颉看成是祖先无数智者的集合体。是这个集合体的探索与实践，创造出了汉字这一人类奇迹。

汉字之所以被认为是奇迹，是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统一的重要力量，而且将是助推中华民族走向光辉灿烂未来的重要力量。

汉字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文字学家从汉字的造字方式、书写方式及其体现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究。这里从思维方式、社会意义、审美意识以及表现方式四个方面略作介绍。

汉字体现人类系统思维的思维方式美。系统思维也叫整体观、全局观，就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进行综合考察，从中寻找到规律从而整体地、综合地、立体地把握认识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系统思维能极大地简化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给人们带来对事物的整体观、全局观。《易》的思维方法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系统思维方法，它用八卦（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将世界系统化。中医阴阳理论其实也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比比皆是，现在所谓的“云”思维也是系统思维。汉字背后的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它的取类思维。许慎的《说文解字》将 9353 个字分别归入 540 部，14 大类。许慎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发现并阐释了汉字背后隐藏的系统思维秘密。如将与“人”有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置于“人”类，将与“心”有关的人的情事纳入“情”类，将与“水”有关的事物置于“水”类，将与木有关的事物置于“木”类……在这样的不断取类中，汉字就将世界有系统、有类别地整体



象形化了。这也是我们的字典在编排时要按部首编排的内在原因，因为部首是类首。

汉字体现人类集体思维的社会意义之美。集体思维又称群体思维，它体现一个团体、一个群族、一个社会体的共性思维特征。这些共性思维特征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具有社会意义之美。汉字“意美”的很大一部分是它承载了中国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社会追求之美。比如“苍颉”二字，“苍”在古代神话中指“苍帝”，苍帝也叫“灵府”；“颉”在古代神话中指“青狗”。人们赋予汉字的创造者一个具有神异特征的名字“苍颉”，背后就隐含着对这个创造者的崇敬。再如“修身”的“修”字，篆文为“𠄎”，是“攸”与“彡”的会意。“攸”即“攸”，意思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木条轻轻敲打以水淋背的人；“彡”，是装饰的意思，两者会意而成洗涤人体污垢，为其装饰，使其美好。所以“修”字体现了人们对完善、完美的共同追求，这从与“修”有关的一系列词语中也可以看到：修身、修善、修敬、修养、修学、修业、修行；修饰、修治、修缮、修剪；修书、修史；修建、修筑……如果我们仔细探求，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汉字都隐藏着民族的共同认知，这正是它的社会意义之美。

汉字体现人类审美思维的审美意识之美。审美意识包括感知、感受、趣味、理想、标准等各个方面，从汉字中可以发现我们民族在这些方面的种种美意识。如“美”字，甲骨文是“𠄎”，由“羊”（羊）“大”（大）会意而成。“羊”“大”为“美”就体现了民族审美意识的三个重要原点：一是味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甘也”，即“硕大之羊，肉味甘甜”是美的。也就是